

從巴赫汀學圈對佛洛伊德主義的批判論 「對話論」另解：以變性敘事為例*

王孝勇**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特聘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從巴赫汀學圈對於佛洛伊德主義的批判，推敲「對話論」的另條解釋路徑與應用性，亦即心理—衝突模式的對話。首先，透過對 *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 一書進行理論回顧與批判閱讀，本研究將指出 Bakhtin 針對精神分析恐懼歷史、去意識化的評述雖揭窺「對話論」的社會—互動性和互為主體性，卻恐難以擺脫某種決定論的結構主義觀。有鑑於此，Bakhtin「行為意識形態」的觀點則有助於重拾對主體內在話語與自我意識的強調。在此，維繫「我一經驗」在本體論上不同於「我們一經驗」的物質性並非本質主義，而是從「自我與他者的對話」轉向「自我與自我的關係」，並推敲後者所體現的心理—衝突如何凝聚其無法「轉化為」外在話語的語藝處境或困境。變性敘事得適切地說明此理論模式。

關鍵字：心理—衝突、巴赫汀、佛洛伊德主義、對話、變性敘事

* 本文為作者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部分研究成果 (MOST 110-2410-H-126-026-MY2)。作者非常感謝《傳播研究與實踐》兩位匿名評審提供的修改建議和鼓勵。

** E-mail: hywang2@pu.edu.tw

投稿日期：2021 年 06 月 15 日；接受日期：2021 年 09 月 07 日

壹、前言

1927年以伏羅希洛夫 (Valentin Vološinov, 1895–1936) 之名出版的 *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 (Vološinov, 1927/1987; 以下簡稱 *Freudianism*) 一書，是巴赫汀 (Mikhail Bakhtin, 1895–1975) 最豐富多產時期的第一本著作。當時俄國歷經十月革命的政治洗禮，整個文化思想界都極為活躍和積極入世。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由 Bakhtin 與其友人們所組織的巴赫汀學圈 (the Bakhtin Circle) 於列寧格勒透過積極籌辦各種讀書會，以論辯對話、集體創作的方式針對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流行於歐陸的諸多思潮，進行深刻又厚實的閱讀和反思。而針對佛洛伊德主義 (Freudianism)¹ 的觀點立場、推論方式和知識特性進行的批判，首先累積了系統性的研究成果問世。該書的內容由於涉及人類意識在言談回應 (verbal reactions) 中方得彼此成就的討論，這些觀點同時也構築了 Bakhtin 本人的思想從早期鑽研的古典政治哲學、美學，到此刻青壯年時期逐漸轉向「語言」這個更具社會性、物質性和政治性範疇的分水嶺。Bakhtin 的「語言學的轉向」(劉康，1995，頁 52) 於本時期另外兩本於 1929 年出版的著作中，² 已臻成熟。

Freudianism 一書中的論述除了對 Bakhtin 畢生最為關鍵的「對話論」具有思想上的啟迪 (Wertsch, 1987)，這使得吾人若欲更有脈絡地理解 Bakhtin，實難略過巴赫汀學圈如何藉由批判佛洛伊德主義的機械因果論、過度在意潛意識 (unconsciousness) 與漠視歷史變遷等問題建立其話語唯物論

-
- 1 必須強調的是，由於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處理某些社會文化主題的書寫出版於 1920 年代之後。因此以 Bakhtin 為首的巴赫汀學圈當時所閱讀和批判的，並非佛洛伊德主義的思想體系全貌 (Wertsch, 1987)。論者甚至指出，以佛洛伊德主義為箭靶的 Bakhtin 批判論述，更大的旨趣實乃指出實驗心理學於 1860 年代始於俄國知識界占主導地位的態勢，使得當時的知識典範慣性地僅從生理學的角度思考社會、政治與倫理問題。佛洛伊德主義只是這個學術旨趣下的一個例說 (Clark & Holquist, 1984)。不過本研究限於篇幅，無法處理佛洛伊德如何兼顧人的心理機制與「複雜的生物、社會、文化因素的交織影響」(劉毓秀，2000，頁 166) 以打造精神分析，更無法論及當時蘇聯知識界整體性的、大規模的學術諸觀點之間的論辯。本研究的重點在於巴赫汀學圈如何在 1920 年代可以接觸到的知識論述中，建立與佛洛伊德主義不同的典範。
 - 2 這兩本著作一本是再度以 Vološinov (1929/1986) 名字發行的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另一本則是首度以 Bakhtin (1963/1984) 真名出版的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Art* (後於 1963 年書名改為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再版，亦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版本)。這裡值得交代的是，雖然現階段國際巴赫汀學界對於相關著作的作者問題多半傾向將 Vološinov 為名的著作視為 Bakhtin 所寫，或認定 Bakhtin 至少有相當程度的投入，只是或許是因為 Bakhtin 當時默默無名，以真名較難獲得出版的機會 (劉康，1995; Clark & Holquist, 1984; Wertsch, 1987)。然而，至今仍有學者堅持署名 Vološinov 出版的著作應該不是 Bakhtin 本人所寫 (見 Morson & Emerson, 1990; Titunik, 1987)。對此，本研究雖傾向從集體創作的角度將署名 Vološinov 的著作視為由 Bakhtin 主導或主筆，因此相關論述仍可視為 Bakhtin 的觀點。但為免進一步落入作者爭議的泥沼，本研究在引述時，仍會以實際出版所列的作者姓名進行標示。

與辯證觀。更重要的是，Bakhtin 在字裡行間所呈現的兩個推論上的偏好或盲點，以及兩個慧心安排的性／別例子，似乎透露出至今已廣為人知的「對話論」尚有另條解釋路徑。

第一點，當 Bakhtin 用內在話語 (inner speech)、外在話語 (outward speech) 的命名重新界定佛洛伊德的潛意識 (unconsciousness) 和意識 (consciousness)，並旋即藉由重新賦予內在話語、潛意識特定的內在社會性 (inner sociality)，³ 使之脫離精神分析下僅關乎情感 (emotion)、動機 (motive)、感覺 (feeling)、夢境 (dream)、性慾 (sexuality) 的生理學和主觀心理學狀態時，Bakhtin 明確地肯定潛意識並非唯心論，更有其「物質性」(Vološinov, 1927/1987, p. 21)。然而在 *Freudianism* 書中的他處，Bakhtin 卻又話鋒一轉，指出潛意識在某些時候乃係「非語言的、厭棄話語的」(同上引，頁 37)，更無法藉由內在話語的運作幫助我們認知自己的社會性。兩相對比，究竟 Bakhtin 如何思考內在話語、潛意識的性質？Bakhtin 難道把他在修正佛洛伊德主義時所提出的應具有社會性的內在話語、潛意識推往一個進入語言之前的歷史先驗存在，和「個體」身處社會對話之前的本質狀態？在「對話論」所揭櫫的意義互動、主體建構與存在事件中，內在話語、潛

3 「內在社會性」是 *Speech Genre & Other Late Essays* 一書譯者 Vern McGee (Bakhtin, 2004, p. 101) 的用語，用以陳述當人類在話語行為中的表述形成了某些相對穩定的、具有特定邏輯和規則的言說類型，那麼即便是任何一個發話者或接收者的內心話語、思想、感受、衝突或意識，都已經超越了個體自主的「我一經驗」(I-experience) 的範疇，而立即進入了語言社群集體性的「我們一經驗」(We-experience) 之中，是為「超語言學」(translinguistics)。在 Bakhtin (1994b；亦見王孝勇，2009) 的語言哲學中，他甚至基於話語互動的每一個片刻都已經奠基於前人表述(包括語言規則、社會文化成規)之基礎，且無人誕生於聖經中的創世紀當然也沒有語言創始者(例如亞當)這個角色存在的認識論，主張在對話論中的「個體」成為「言說主體」以行使話語行為並成就自我存在價值的過程，並無時間差。易言之，對話論所投射和預示的，乃是情境脈絡化、物質性的、歷史性的社會對話，且根本性地否定有一種個體或主體的狀態「先於」言談回應而本體存在。對此，本研究雖然同意 Bakhtin 從社會一互動論的視角來論述日常性語言的「常態」與一般性景況，也充分認知到 Bakhtin 對於歷史先驗性和超驗性的拒斥，以及這樣的立場如何啟發後結構主義的語言與文化思想；但是，本研究亦將透過 Bakhtin 佛洛伊德主義研究所流洩的偏向和可能的盲點，直指一種縱非關乎日常性語言「常態」，卻更能瞄準個體或言說主體的思想在「轉化為」(turn into) 社會一互動對話過程之際(而非進入社會對話之「前」)，所確切體現的身、心衝突感，以及這樣的感受如何揭櫫心理一衝突性的(非常態的)對話，亦即本研究題目所示之另解的「對話論」。本研究後續更將透過「變性敘事」(transsexual narratives) 的分析，探索心理一衝突模式對話之應用性和解釋力。

意識有沒有一個相對的理論位置？⁴ 第二點，當 Bakhtin 以非官方意識形態 (unofficial ideology)、官方意識型態 (official ideology) 的語彙再詮釋內在話語 vs. 外在話語，並創造出「行為意識形態」 (behavioral ideology) 此一原創性的術語用以描述人類主體話語行為中涉及內在話語和外在話語的所有動態關係時，他一方面宣稱行為意識形態因其敏感、生動和回應性，得以適時地裂解官方意識形態並創造法律、道德和世界觀的變遷革命；⁵ 但另一方面，Bakhtin 旋即火速地改口指出在「健康的社群和社會個體中」 (Vološinov, 1927/1987, p. 89)，行為意識形態能展現官方與非官方之間「沒有分歧」 (同上引) 的社會經濟基礎。我們如何面對這樣的看似內在矛盾？Bakhtin 對於官方意識形態到底採取何種政治立場？

對此，劉康 (1995, 頁 126) 語帶浪漫地緩頰，認為 Bakhtin 此處「所希望的，乃是一種健全的理性社會，……也曲折的反映了他對於蘇聯社會日益僵化、強硬的史達林文化專制主義的擔憂和抗議」。本研究不甚同意這個說法。因為史達林對於蘇聯知識文化界的「大清洗」 (the Great Purge) 始於 1930 年代，而 Bakhtin 被政治迫害和流放亦迅雷不急掩耳地始於那時。要說 Bakhtin 研究佛洛伊德主義的當下已經充分感受到外在政治局勢從原本的開放到大幅度地限縮，可能需要更多的舉證。⁶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同意 Clark

4 這裡必須針對潛意識、內在話語 vs. 意識、外在話語在本研究中的呈現，作一交代。首先，潛意識、意識是佛洛伊德的用語，而內在話語、外在話語則是 Bakhtin (Vološinov, 1927/1987) 所鑄造的詞彙。當 Bakhtin 要對佛洛伊德主義進行理論攻防時，他確實會將潛意識、意識掛在嘴邊。然而，由於 Bakhtin 主張精神分析在認識論上的問題，在於後者雖提及但較不重視「語言」、言談回應，此舉使得個體經驗的表達，乃至於性、本能、感覺、慾望的抒發缺乏物質性與社會性，而停留在個人心理學與生理學的層次。Bakhtin 更直指若無語言的幫忙，則我們無法讓自己「意識」到任何事情，遑論對「潛意識」進行推敲甚或排除。這裡，內在話語和外在話語的命名 (以及本研究馬上會提到的「行為意識形態」的觀點) 隨之出現。內在話語指的是佛洛伊德所述的潛意識的脈絡化。這部份因為相對而言 (並非絕對) 比較容易抵觸主流官方的價值體系，而被視為具有非官方的屬性。反之，外在話語則具體傳遞了既定主流且經常為官方所背書的法律、道德與世界觀。據此，至少在 Bakhtin 的書寫脈絡下，我們可以說潛意識、內在話語是相對於意識、外在話語的一組概念；只是，由於佛洛伊德的原意較不強調語言，因此 Bakhtin 仍比較傾向使用內在話語、外在話語進行陳述。本研究基本上亦延續這樣的書寫偏好。而當內在話語、潛意識 (或外在話語、意識) 須同時出現方能清楚表意時，本研究則以頓號加以隔開。

5 正文這段文字體現的未了性 (unfinalizability)、開放性基本上貫穿了 Bakhtin 一生的知識信仰，也是他對後輩學者在「對話論」的理論演繹 (Farsi, 2015; Sucéska, 2018; Xu, 2013) 和觀念應用 (Capizzo, 2018; Collado & Besoain, 2020; Dey, 2015; Guillemette, 2017; Milthorpe, 2015; Schwarz-Franco, 2018; Suárez, 2015; Vitanova, 2013; Zou, 2018) 上最為關鍵的民主啟發。一般認為，Bakhtin 揭櫫的透過某種形式的對話互動，得以凝聚持續進行社會改革、解構僵固認同、置換權威教條主義的語藝動能，實乃「對話論」的政治寓意與核心要旨。

6 Titunik (1987) 指出，在 *Freudianism* 一書於 1927 年出版前，巴赫汀學圈至少在兩年前就已經以 Vološinov 之名出版了討論佛洛伊德思想的文章 "Beyond the Social"。雖然該文並未論及語言以及後續在專書中提及的「言談回應」，但可見 Bakhtin 與學圈成員對佛洛伊德乃至於當時歐陸思想的批判研究，最晚於 1924 年 Bakhtin 遷往列寧格勒時即開始。當時的蘇聯基本上是一個相對開放的政治社會。

& Holquist (1984, p. 183) 所言，Bakhtin 對於開放政治修辭亦即非官方話語意識如何挑戰官方思維的堅持不容置疑，只是在他研究佛洛伊德主義的階段，確實對於官方與非官方之間的周旋折衝描述，顯得「初探和不成熟」？

事實上，若僅從 Bakhtin 佛洛伊德主義批評中的一些矛盾修辭論斷其不在乎主體的內在話語、甚至是向官方意識形態的暴力性質輸誠，確實言過其實且過於嚴苛。因為在 *Freudianism* 一書的字裡行間，Bakhtin 曾罕見地提及兩個與性／別議題相關的例說，展現其既關注個人心理面向又嚮往開放社會的態度。

首先，Bakhtin 說佛洛伊德主義過度高估了生活與意識形態中的「性」，尤其是性的「非社會」面向，是一種極度片面的理解方式。甚至，當「性」成為了「社會」的替代品，則「所有人皆被區分為非男即女，其他的次類目都將被認定為不具意義」（Vološinov, 1927/1987, p. 90）。這裡清楚揭示出 Bakhtin 對於破除主流社會性／別二分法的企圖。更重要的是，此舉並非拒斥談論人的「性」，而是不滿「性」被去社會化地解釋掉（explained away）。我們可以說，「性」這個在 Bakhtin 的佛洛伊德主義研究中被初步歸類為內在話語、潛意識、非官方意識形態範疇的基調，不但應被重新正視（而非被視為非語言的、生物學的部分），其中更值得關注和放大的是內在話語與外在話語之間的對話「矛盾」。例如特定性／別主體在體會外在世界的主流性別價值觀之際，反身性地認知到自我無法被置入其中的困境也難以逃逸抽離，因而產生相應的言談回應或外顯的身體打造。在此，個體的「心理—衝突性」（psychic-conflictual model）而非個體因為欲求獲得社會肯認的存在身分而被無縫接軌地整併入、「轉化為」（turn into）外在話語之中的「社會—互動性」（social-interactional model），或許是 Bakhtin 此刻所想的另番（微弱）光景。

其次，我們是否能夠期待官方意識形態的運作在特定的歷史時間和階級中，得以體現並實踐法律、道德和世界觀的偶然性（incidental character）而非獨白性？亦即外在話語的思想體系並不是全然絕對的霸道，迫使每一個與官方意識形態相左或衝突的動機或行為，都必然產生退化或妥協？對此，Bakhtin (Vološinov, 1927/1987) 舉的例子是柏拉圖《會飲篇》（*Symposium*）中，古希臘統治階級流行時興的同性戀傾向或行為，陳述在許多脈絡與文化中因不見容於當道而被監視、壓抑為潛意識的內在話語或性慾望，縱使發展於一個小型的、檯面下的社會環境（而非僅關乎單一個體的動機），仍有主

體得順從其內在話語意識或自我真理進而產生某種效應的機會。Bakhtin 特別強調，這裡所述的並不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完全瓦解或者吾人對於解放、抵抗、革命的一般性想像，亦非由下而上的策略擊劃與解構行動，而是內在話語的確切存在，還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官方意識形態所意圖造就的更廣泛、更持續、更定型的社會連結之不易得，或至少是絕非一蹴可及。

這裡，Bakhtin 似有借助原屬精神分析的用語（例如潛意識、動機、慾望）去論述內在話語從何而來？內在話語與外在話語之間的心理一衝突為何？以及內在話語的某種存在「本體」如何「非故意為之地」折射出吾人慣習的外在話語乃至於社會經濟基礎之相對偶然性？等議題。只不過，此時 Bakhtin 的推論尚待更具體和直接的鋪陳。

事實上，嘗試接合 Bakhtin 「對話論」與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中部分用語的理論或經驗研究，確實是西方學術界逐漸萌芽的知識計畫。論者指出有別於過去精神分析可能因為在臨床診斷和文化哲學上流於獨白主義，傾向在身、心與外在世界之間劃出某種距離，「對話論」的互為主體性有助於吾人另闢蹊徑，以探索不同主體之間的相互滲透性以及語言於其中扮演的建構功能（Kristeva, 1980; Muller, 2016）。延續這樣的主張，亦有學者指出 Bakhtin 「對話論」的精神分析意涵，在於其直指個體的心理、精神衝突可透過語言而展現和轉化（Macaskie, 2016）。因此，人的主觀情感、感受不僅應是對話互動之際的重要母題（Hinchion & Hall, 2016），精神分析強調社會文化等諸多因素乃彼此作用而投射於個體心理層面的實質討論，當能挹注後續論者從佛洛伊德對於主體的內在關係營造（intrapersonal relationship）延伸至團體成員間彼此透過互動以建構某種契約關係的對話過程分析（Lamarche, 2017; Yanchuk, 2018）。⁷

相關研究成果的累積至今雖然並不真的非常多，但本研究認為現階段融合兩大典範所欲提出的觀點建構，已經逐步揭示出 Bakhtin 「對話論」的利

7 不過，這些相關論述大多數是來自精神分析派，或以精神分析為本位的研究。巴赫汀學圈中至今少有後繼者系統性地重新檢視 Volosinov。間接相關的可能是 Emerson (2015) 的專文。她認為 Bakhtin 在精神分析經典個案伊底帕斯情結 (the Oedipus complex) 的舉例中，似乎暗示著在作者—中心論 (author-centric) 之外，尚有一種角色—中心論 (hero-centric) 的設定。前者容易被清晰劃界、辨識且缺乏政治甚或自我意識，後者卻有難以被抑制、抹煞的「內在性」。Emerson 雖然並未就此一內在性進行更多的推敲，也坦承 Bakhtin 的「對話論」較傾向從外部、互為主體的角度思索戲劇與表演藝術的舞台性，但 Emerson 說 Bakhtin 並不鼓勵和期待各種內在性在封閉體系中退化瓦解。本研究認為，Emerson 從一種否定「極端內在性」（同上引，頁 200）的意識或拒斥「保護主義的內在自我」（同上引，頁 201）的角度思考巴赫汀學圈對佛洛伊德主義採取的觀點，確實有助於將精神分析的性、本能、感覺、慾望之不可化約性，進一步連結至 Bakhtin 的思想體系。本研究可能的理論貢獻，也在於此。

基與可能的囿限。Bakhtin 擅於論述主體與他者在話語交織過程中的互為鑲嵌。他將這樣的互動放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話語片刻，想像其中的意義生成與話語意識的挪用（王孝勇，2009，2012），其中更有突破僵局、挑戰權威的民主化意涵（王孝勇，2011，2013，2014），甚或是互為主體性的理解並非獲致某種定論和共識的主張（王孝勇，2019）。但是 Bakhtin 因為醉心、著迷於人類話語意識生成的社會—互動論，並且試圖藉此跟精神分析建立不同的學術品牌，因此其「對話論」雖然意識到人的心理機制、內在話語與非官方意識形態亦具有難以抹滅的物質性，仍傾向將人類主體建構過程中的心理—衝突性給淡化處理甚至輕視其存在價值。

本研究據此提出的初步觀察是，Bakhtin「對話論」擅長分析「自我與他者」的語言常態互動，但在面對「自我與自我」的特殊對話關係或心理—衝突性時，則顯得捉襟見肘。而內在話語意識與自我意識建構的理論化，以及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化如何落實在具體的現象分析，是本研究重要的問題意識。心理—衝突的對話可被定義為主體的行為意識形態因其內在話語的自覺，而無法進入社會—互動性的一般日常對話場域並「轉化為」外在話語之語藝處境或困境。

某種程度地呼應 *Freudianism* 一書所提及的兩個性／別舉例，「變性敘事」（transsexual narratives）主張以變性者說故事的方式建立一種與主流社會順性別（cisgender）認同有異的性別腳本，於 1990 年代至今逐漸成為性／別與跨性別研究的新興視野。提出此一概念的學者 Jay Prosser（1997, 2006；亦見趙庭輝，2019）強調，變性的心理動機來自於特定性／別主體對於出生時所被賦予的生理性別產生矛盾。身、心的不一致除了意味著主體對於內在意識的感覺形成認知與堅持，更需要透過外表能夠被看見、目睹、見證、辨識的姿態與身形而被確認，方能化解。Prosser（1998, p. 6）更說，變性過程（transition）除了挑戰了酷兒理論側重性別、性別展演而忽視性（to disembody sex）、感覺、慾望、心理的偏向，更有相當深刻的物質性。因為透過變性敘事所揭櫫的變性過程，我們有機會看見跨性別如何浮現為一個亦可被分類的主體（a classifiable subject），並據此建構「融合心理、身體和社會變遷」（同上引，頁 4）的文化理論與政治。

變性敘事現階段所展現出的理論意涵，尤其是其視角聚焦於將「身體」視為一個必須被「靈魂」給激活的場域，據此強調變性主體「內在、精神生活」（Reinsmith-Jones, 2013, p. 65）的重要性，更與 Bakhtin 在佛洛伊德主義

研究中提及的諸如內在話語、外在話語等詞彙有相當的呼應，其細部的意涵值得仔細推敲。對此，本研究將嘗試透過變性敘事的研究案例，對 Bakhtin「對話論」應涉及卻至今仍為人所輕忽的心理—衝突性進行理論說明和應用。

綜上所述，本研究旨在從巴赫汀學圈對於佛洛伊德主義的批判，推敲「對話論」的另條解釋路徑與應用性，亦即心理—衝突模式的對話。首先，透過對 *Freudianism* 一書進行理論回顧與批判閱讀，本研究將指出 Bakhtin 對精神分析強調衝突性的肯認，及其流洩出的恐懼歷史、去意識化的評述確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更得藉此揭橥了「對話論」強調社會—互動性的理論偏好。然而，過度熱切、單方面地強調言談回應的互為主體性，卻也矛盾弔詭地將話語行為的內在話語意識推向一個無關乎社會、不涉及語言的真空狀態 (linguistic nonzone)。社會—互動性的對話恐因此難擺脫某種決定論的結構主義觀。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透過巴赫汀學圈在佛洛伊德主義研究中所提出的「行為意識形態」的觀點，重新拾回「對話論」對主體內在話語與自我意識的強調，並主張 Bakhtin 所提出的語言景觀在某種程度上仍保有內在話語與外在話語之間的斷裂矛盾，而非對話整合或互為主體。巴赫汀學圈 (Vološinov, 1929/1986, p. 88) 經常性地將「我一經驗」看作是「我們一經驗」據此傾向否決前者的存在，在此得到了一種修正主義式的平反，更暴露出 Bakhtin 雖實際點出某種內在衝突的對話態勢，卻對此語帶保留甚至是前後不一的狀況。

最後，本研究將從具體的研究案例說明「對話論」的心理—衝突性。受到變性敘事研究的啟發，本研究將指出跨性別的自我認知浮現於內在話語與外在話語持續矛盾的可理解性的邊界 (limits of intelligibility)。內在話語或者精神分析所宣稱的被壓抑為潛意識的心理部分，除了建立一種並非將「我一經驗」與生物生理學和解剖學上的性／別二分法畫上等號，或傾向從後者界定前者的另種語法，亦與變性敘事研究對於心／內在、身／外在矛盾性的關懷 (Reinsmith-Jones, 2013) 多所疊合，或至少具有意義上的互為指涉性。

貳、巴赫汀學圈論對佛洛伊德主義的勾勒

以下，本研究將透過 Vološinov 對佛洛伊德主觀心理學的脈絡化與其潛意識和性本能理論的定調，推敲巴赫汀學圈所勾勒的佛洛伊德主義。

一、佛洛伊德主義的提出脈絡與潛意識觀

按照 Vološinov (1927/1987) 的觀察，佛洛伊德主義於歐陸的起源，可追溯至 1893 年。最初它僅是一種初探性的、謙遜的臨床心理治療法。但在短短的數十年間，精神分析的心理學理論被歐洲小資產階級 (petit bourgeois)⁸ 擴大應用至藝術、宗教乃至於社會和政治生活諸多層面。⁹ 此舉使然，Vološinov 指出最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精神分析逐漸脫離了其最初純粹的精神病學內涵，而建立了屬於自身的文化哲學。精神分析的影響力更於 1920 年代晚期擴散至美國。它如何藉由與現代心理學中的客觀主義派別在知識上進行區隔並建立自身的主觀主義心理學，是巴赫汀學圈感興趣的點。

Vološinov (1927/1987) 指出，當代歐洲心理學大致有兩大派別：客觀心理學 vs. 主觀心理學。前者包括了巴夫洛夫 (Ivan Pavlov, 1894–1936) 古典制約論的反射學派 (reflexology) 以及盛行於美國的行為主義效果研究；後者則是實驗心理學以及稍晚出現的佛洛伊德主義。

客觀心理學主張若欲探討人的內在心理，則必須透過一個局外的、科學

-
- 8 Vološinov (1927/1987) 曾經不只一次地指出佛洛伊德主義與當代歐洲小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兩者在基本前提上有著堅固的連結。這個連結一是佛洛伊德極為高估「性因素」(sexual factor; 同上引, 頁 89) 並以之作為論述的預設，這在資本主義社會現行的社會分化和區隔 (disintegration) 中亦是相當明顯的現象；另一點是佛洛伊德對於「監看」(censorship; 同上引) 的討論明顯地反映出小資產階級的行為意識形態，而無法適用於描述古希臘或中世紀農夫的心理動力學。因此 Vološinov (同上引, 頁 127) 宣稱：「佛洛伊德主義的意識形態觀點，跟馬克思主義是水火不容的」。不過由於 Vološinov 凸顯佛洛伊德主義的特定階級意識的討論並未持續地在他的書寫中深化，本研究無法對此提出更多的推敲。但可以肯定的是，Vološinov 藉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批判精神分析，最重要的論點旨在陳述後者缺乏社會性與歷史感，使其對於心理動力的動態性乃至於辯證性缺乏了物質基礎。而這裡所提出的諸多概念，都將陸續出現於本研究的正文內容中。
- 9 *Freudianism* 的第六章，就在陳述佛洛伊德主義所言與先民時期各民族神話之間的驚人巧合，尤其是伊底帕斯情結和閹割焦慮 (the castration complex) 的普遍解釋性與文化體現。例如某些建築形式、古代雕像中呈現或站或坐的人體姿態乃至於葬禮儀式，都彰顯出死亡作為回歸母親子宮的潛意識理念。這些討論不難看出 Vološinov (1927/1987) 有意藉此提陳精神分析從生理學走向哲學的變遷，並據此化身為當代盛行的知識典範之趨勢，以及更重要的是與此一趨勢對話和對峙的迫切性——即便 Vološinov 也發現精神分析在二十世紀初德國知識界受到的關注，並不如其在蘇聯所帶來的影響力。

性的領會方式，讓每件事物得以被計算、被測量並且被因果化。而「唯有這種物質上得以展現的人類和動物的行為，方能建立心理學中的研究對象，並維繫其精確性與客觀性」（Vološinov, 1927/1987, p. 20）。從這個立場出發，客觀心理學認為主觀心理學派雖也操作心理學實驗，卻過度仰賴實驗對象內在的自我觀察和自我報告，恐流於唯心論，亦無法面對實驗對象的內在話語與實驗者的外部理解產生矛盾的狀況。

然而，客觀心理學這個看似「比較接近馬克思主義唯物論」（Vološinov, 1927/1987, p. 21）的流派，卻因其發展才剛剛起步，使得在方法論上明顯流露出一種「天真的、機械性的唯物論」（同上引，頁 23）和「生物一元論」（biological monism）（同上引，頁 129）。它務求將實驗對象的內在經驗全然地轉化翻譯至某種外部理解的語言之中以便讓實驗者掌握。相對於此，佛洛伊德主義則透過強調人類語言範疇中的心理現象之衝突性，一方面修正過去主觀心理學的某些偏向，另一方面更提出自身的潛意識論與性本能論，建立了與客觀心理學甚至是當時主流的主觀心理學派皆有所差異的知識路徑與推論方式。

首先，不同於稍早實驗心理學與其他主觀心理學等舊心理學（old psychology）從「心理學樂觀論」（the psychological optimism）（Vološinov, 1927/1987, p. 76）的角度想像心理生活乃是「所有事情皆和平、安靜，每件事情都被放在對的地方，沒有危險更沒有災難；人從生到死，皆走著一條平靜安穩的直路，有目的地往前邁進」（同上引，頁 75-76），佛洛伊德主義帶來的思想震撼性是其特別強調心理生活的「衝突、混亂與不安」（同上引，頁 75）。這種立場偏向使得佛洛伊德在實驗心理學當道的年代，確實在心理觀上示現一個最基進的改變。也正是本於心理—衝突模式的觀點，佛洛伊德主義雖奠基於人類的口語表述與言談回應，但卻旋即表現出對於「人基於自身意識而對外進行語言表達」這個主觀和客觀心理學都論及的機制，某種程度的懷疑。¹⁰

Vološinov (1927/1987) 指陳，有別於一般認為所有的表述皆建立在「意識」的領域，佛洛伊德主義並不相信意識的表面動機，反而選擇深入心理的

10 Vološinov (1927/1987) 說明，當時歐陸的主觀與客觀心理學派雖然在知識論上有所不同，但兩者卻皆仰賴透過實驗法的刺激反應探索實驗對象的「內在自省」（introspection）；且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內在自省被視為是探索人類「意識」的重要和唯一依據。這點與佛洛伊德主義雖仰賴內省法蒐集治療歇斯底里症和各種恐慌症的素材，但傾向從「潛意識」的層次理解人的「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和自我敘述，有根本的差異。

深處。這裡，佛洛伊德並未從客觀的面向思考語言行為，亦未尋求表述的社會背景；相反地，他嘗試去尋找「潛意識」並將其界定為「在表述之中，行為的**真正動機**」（同上引，頁 76）。以下這個例子清楚呈現出佛洛伊德主義的潛意識觀。

Vološinov (1927/1987) 提到，1889 年的佛洛伊德是一位年輕的維也納醫生。他對於著名催眠家伊波利特·伯恩海姆 (Hippolyte Bernheim, 1840–1919) 的實驗感到印象深刻。這個實驗是說一個年輕的女人在被催眠後，接收了一個指令：在清醒後的一段特定的時間，要走到房間的角落，拿起放在那兒的一把傘。清醒後，在指定的時間內，那個女人真的執行了指令。在回答自己的行為動機時，她表示她那樣做是想要確認兩傘是不是自己的。這個動機回答跟行為的真正原因並不一致，顯然是行為之後才想出來的。但這個回答卻可以滿足病人的意識，也讓她真切地相信自己打開兩傘是基於自我的意志，而其目的在確認兩傘是不是自己的。雖然該實驗的尾聲，Bernheim 透過不斷的提問病人並且引導她的思考（即自由聯想法），最終才讓她想起來自己行為的真正原因，是因為被催眠下了指令。但這個年輕女人的心口不一、內在意識與外在行為動機之間的斷裂，卻也讓佛洛伊德充分認識了「意識」的侷限，更是他後續論述「潛意識」的基礎。¹¹

對佛洛伊德而言，是「潛意識」而非在語言範疇內的「意識」方為探索心理失序、感覺、慾望的切入點。他甚至指出潛意識在某種程度上乃是「非語文的」(nonverbal)。¹² 因此在臨床上若欲治療病患的歇斯底里症與各種恐慌，單純仰賴病患的自我「意識」或內省縱使得獲致一些線索，終究難以到抵人心深處最黑暗的境地。易言之，人基於道德良心而壓抑進潛意識的部分情結，無法僅透過內在自省而充分地揭露和排除 (live out)，以治癒心理疾病或創傷。潛意識的重要位階，在佛洛伊德進一步提出的性本能理論 (theory of sexual instincts) 及其中享樂原則 (pleasure principle) 與現實原則 (reality

11 這裡所提出的潛意識觀點，按照 Vološinov (1927/1987) 的說法乃是佛洛伊德早期的主張 (1890-1897)，更型塑了當時佛洛伊德與醫師同儕 Breuer 在面對歇斯底里症患者所使用的「淨化治療法」(cathartic method) (同上引，頁 33)。亦即藉由持續的提問和長期觀察，醫生試圖探索那些潛藏在病患潛意識深處的羞愧和恐懼經驗，並把它們帶回意識層，讓其自然地宣洩和排除 (Freud & Breuer, 1895)。Vološinov (1927/1987) 同時也指出精神分析在之後的發展更趨系統化，當中也有些實質的轉變和拓展，但不變的乃是對於潛意識的強調。

12 在 *Freudianism* 書中的頁 37 與 48，Vološinov (1927/1987) 兩次提及潛意識的非語文性。前處 Vološinov 指出潛意識無法用語言這個基本上被認為是意識端所結晶匯聚的系統給清楚言明，後者則強調人的自我仍勉力尋求合宜的語文與潛意識產生連結，使其「轉化為」準備進入意識層並尋求化解的言談回應。兩處的書寫呈現一致性，更揭櫫精神分析雖以潛意識為本，卻更在意的是潛意識與意識之間的交鋒。

principle) 間的折衝動態裏，有更為明顯的樣貌。

二、佛洛伊德主義的心理—衝突論

佛洛伊德主張心理活動的運作，奠基於我們的感官所體驗到的肉身刺激，亦即天生固有的性本能。他指出人在孩童階段時的性本能，建立在「一切皆允許」(Vološinov, 1927/1987, p. 40) 的享樂原則。且由於生殖器官在性慾生活中的主宰性尚未建立，孩童的性區分、性慾望因為未蒙受社會道德律法的規範，於是可以自由地與任何過程(例如：哺乳)或器官感受(例如：排便)加以連結並從中獲得性快感。這裡 Vološinov (1927/1987, p. 41) 提醒我們，佛洛伊德所示的人類心理發展歷程的整個早期階段，確實被放置於「意識之外」。無怪乎佛洛伊德把成年人的性倒錯(sexual perversions)視為「退化的正常現象」(retarded normal phenomenon)(同上引)。

然而，伊底帕斯情結繼之滋生。此一佛洛伊德主義最重要的認識論所體現的閹割焦慮，使得孩童因為對母親的愛戀以及伴隨而至的對父親的憎恨，逐漸妥協於父親律法所揭櫫的現實原則。父親聲音連同其中的禁制(例如以閹割威脅摧毀孩童意圖與母親亂倫的慾望)接著轉變為孩童所擁有的良心(conscience)。良心與亂倫慾望之間難解的、持續的鬥爭使然，後者更因恐懼感、羞恥心而必然被壓抑至「潛意識」之中，使得伊底帕斯情結從屬於全然的失憶。這裡，佛洛伊德主義具體點出了「監看」(censorship)(Vološinov, 1927/1987, p. 42)亦即超我(super ego)的規範化力量。官方意識、父親律法於現實原則中現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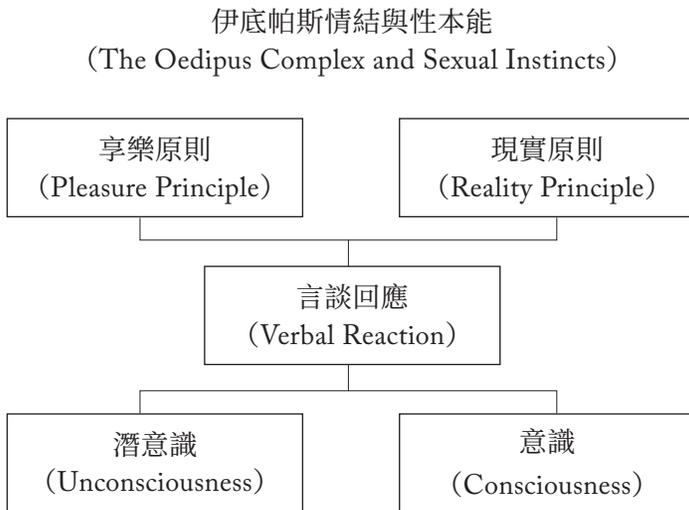
Vološinov (1927/1987) 進一步指出，從佛洛伊德主義對伊底帕斯情結的揭露看各民族間都廣泛流傳著亂倫的神話故事迷思，可見人基於享樂主義的感官、慾望、經驗滿足由於面對官方意識的監看而產生某種內在壓抑，具有相當程度的文化普遍性。這種心理—衝突性可能導致各種各樣的精神病、恐懼症和噩夢。吾人唯有透過對「潛意識」加以推敲探索，方能有機會排除。自由聯想法(free association)的操作在此被直接地提出：

應該讓心理獲得充分的自由，所有意識的約束和批判能力應該被放鬆。我們必須允許任何事情都能浮現於腦海，即使是那些最古怪的思想或者與所分析的夢境看似沒有明顯關聯性的想法。……我

們必須努力地只去關注那些偶然地源於心理之中的東西 (Vološinov, 1927/1987, p. 50)。

事實上，自由聯想法也是種內省法。它以實驗對象、病患、語言使用者的自我報告判斷主體的心理發展過程或創傷。只是這裡的話語行為由於遭逢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的衝突拔河，使得其主題必然凸顯監看、超我、父親律法當道之際，慾望被壓抑至潛意識之中以成就良心的心理—衝突性與矛盾。自由聯想法下的內省修辭也似乎因其更允許毫無邏輯的線索浮現，且放棄找到其中的關聯性索引，而使得潛意識的非語文素材有進入和介入由意識所操控的言談回應，進而被找到病因以排除。本研究將佛洛伊德主義的主觀心理學，繪製成圖 1：

圖 1：佛洛伊德主義的主觀心理學圖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如圖 1 所示，人類主觀心理的衝突運作模式，展現為言談回應中潛意識與意識之間的持續互動。本於現實原則的意識層在孩童社會化的繼之階段，會透過伊底帕斯情結的運作形成對孩童的警戒與威脅，逐漸形成孩童的良心。前期來自性本能的享樂原則因此被壓抑為潛意識，甚或形成人類心理深層的恐懼。但這些難以名狀的被壓抑的慾望、情感若有一天能透過自由聯想的內在自省找到宣洩管道，則歇斯底里乃至於整個文化中的集體焦慮，有

機會得以排除——儘管佛洛伊德認為當我們努力去關注那些源自心理深層的慾望時，經常會面對由監看、超我、父親律法所統管的「我們的意識端」（Vološinov, 1927/1987, p. 50）敏感地加以抵抗和阻礙。

整體而言，佛洛伊德主義始自不滿客觀心理學的機械因果論，同時也對於時興的實驗心理學忽視人內在意識的心理—衝突性感到疑慮，據此提出從意識探究潛意識、從自由聯想的內省敘述找尋心理困境成因的主觀心理學，雖然看似仍有諸多的待解之謎，但它嘗試去探究人類此一整體存在的言談互動所型塑之諸過程與機制，仍使得精神分析與巴赫汀學圈所欲建立的馬克思主義心理學在「人類意識的文化和歷史特殊性」（Wertsch, 1987, p. viii）上，有共通的關懷。

以下本研究將指出，巴赫汀學圈所欲建構取而代之的馬克思主義心理學，雖然強調社會—互動性的對話，但確實蘊藏著心理—衝突模式的身影。只是，後者這條路徑在 *Freudianism* 一書中顯得語帶保留甚至是多所矛盾。

參、從佛洛伊德主義到 Bakhtin 典範，及其餘數

Freudianism 一書的撰寫，旨在植基於客觀的方法對人類意識形構的辯證性和內在社會性進行系統性的勾勒，此即馬克思主義心理學（the Marxist psychology）。所謂的客觀方法，源自古典馬克思的唯物一元論（material monism）傳統但又修正其不在乎意識形態、思想、意義的基調，進而主張對話語行為、言談回應和人類心理的存在感與歷史性進行歸納整理。在此基礎上，Vološinov（1927/1987）藉由對佛洛伊德主義提出些許質疑，提出自身的物質論、互動論與意識論，並揭櫫社會—互動模式的「對話論」偏向，或可稱之為 Bakhtin 典範。

一、馬克思主義心理學的社會—互動模式偏向

Vološinov（1927/1987）首先提問的是，精神分析是否如自身所言，與其他心理學取徑之間的差異頗大，抑或是彼此其實殊途同歸？

Vološinov（1927/1987）說，無論是主觀或是客觀心理學，其對於人類心理生活的思考皆傾向將其拆解為感官（sensations）、呈現（presentations）、意志（will）、慾望和感覺等元素。而我們在精神分析的論著中看到的乃是一

樣的用語。對此，Vološinov 認為佛洛伊德主義事實上具體維持了那些在當時心理學界所普遍使用的術語、定義和區分，可謂「教條式地挪用了心理現象的舊有分類」（同上引，頁 68-69），並未展現出其因轉而關注心理—衝突動力學而重構思想體系的企圖心。甚至，「所有這些心理元素被毫不批判地轉移至潛意識的範疇」（同上引，頁 69），使得這樣的觀點實乃缺乏物質性而無法被外在理解：

當一個人自我意識地開始其行動，當然他不可能說不出其感覺、慾望或呈現；但一旦我們開始去「客觀地」分析那些行動，並且努力地對其一致性和完整性加以外部理解時，我們將無法找到任何組成該行為的元素。外在的、客觀的理解必須仰賴行為之不同的——「物質的」——基本的組織（*different-material-elementary components of behavior*），這些組織成分和慾望、感覺、呈現毫無任何共同點（Vološinov, 1927/1987, p. 69）。

承上所述，Vološinov (1927/1987, p. 71) 主張佛洛伊德主義從未也無法有效地處理身體有機結構的物質組成和過程，而只尋求「心理中的肉身反應」（*somatic reflections in the psyche*）。這是種「肉身心理化」（*psychologization of the somatic*；同上引）。在此，潛意識被轉變為一個自以為生動多樣的封閉世界，其中所有的慾望都有特定的對應。¹³ 精神分析難逃機械性的困境，更無法走出意識、潛意識和前意識（*preconscious*）¹⁴ 的無盡循環短路。

再者，Vološinov (1927/1987) 質疑，當佛洛伊德將語言表述（例如病人的自我敘事以及他和醫生對話時的陳述）置於其理論的基礎取材時，我們

13 這裡，Vološinov (1927/1987, p. 71) 特別以佛洛伊德的「性感帶（*erogenous zones*）學說」為例，指陳精神分析在解讀人格特質時的機械性。他說，佛洛伊德宣稱肛門區（*anal zone*）在孩童性慾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認為那會對人一生的特殊傾向有所影響。因此，肛門性慾（*the anal erotic*）用以下的方式發展出節約（*frugality*）和節儉（*parsimony*）：孩童夾住糞便並延長排便的時間，目的在獲得最大的性快感；而這一點延續到成年期（肛門性慾已經從屬於壓抑且成為了潛意識），就轉變為掌握和儲藏像屎（*feces*）一樣的黃金（錢）。這樣的解釋方式亦被精神分析大量地運用於夢的解析。對此，Vološinov 直指性感帶學說「毫無談到內在於身體建構的任何物質基礎，更沒有論及周遭環境所造成的物理性和客觀性的社會效應」（同上引）。這使得「人格特質型塑的整個過程都座落在主觀心理範疇之內，而這個範疇是一個孤立的整體」（同上引，頁 71-72）。

14 值得註記的是，雖然 Vološinov (1927/1987) 確實提及佛洛伊德主義於人類心理的區分，可分成意識、潛意識和前意識這三個區域，但他在實際進行論述時，多半僅從「意識與潛意識互相競爭和衝突的結果」（同上引，頁 29）思考權力鬥爭和人類心理的發展。在少數提及「前意識」的段落中，大致將其界定為從潛意識被帶回的記憶、慾望或感受，但尚未進入並等待進入意識層或語言的中繼站。據此，本研究在論述時，也傾向暫時不論前意識的角色位置。

能夠認定這些表述就是病患個體心理的闡述嗎？又或者，佛洛伊德主義僅僅是將外在世界的互動關係「投射進心理的世界」（同上引，頁 78）？

以醫病關係的對話為例，Vološinov (1927/1987) 指出一個病人在求診時可能會對醫生隱瞞一些事情，或者主動提出自身對於病因的詮釋，以規避醫生提問的可能威脅。醫生則試圖藉由強調自己的權威性，盡力去迫使病人自白，對自身的疾病和徵狀提供「正確的」觀點。這樣的話語意識交鋒若再搭配著醫病之間的性、年齡、社會地位的差異和差距，則這場對話關係可說是鑲嵌在極端複雜的社會關聯與歷史脈絡中。對此，Vološinov 宣稱人類話語行為從內在對話到與他人互動的每一種型態，都「並非來自言者主觀的經驗，而是來自表述所發生的社會情境」（同上引，頁 79）和歷史；且更重要的是，「內在話語與外在話語一樣，都是同一種社會交際的產物和展現」（同上引），其間的衝突，「不是自然力量在衝突著，而是人與人的衝突」（同上引）。而無法關照語言的社會互動性之精神分析視角下的人類心理，只能是單面向的、簡化的對複雜社會現象的主觀斷言。¹⁵

此外，Vološinov (1927/1987) 質疑當佛洛伊德主義一貫以來不相信意識，對於人基於意識而用來真誠地解釋或評論自己行為的動機採取根本的批判，並主張從潛意識的角度尋找人類內在話語的宣洩出口時，意識與潛意識真有根本的異質性？或者潛意識只是意識的另種表現形式？對此，Vološinov 主張精神分析透過自由聯想法所揭露的潛意識的動機，僅僅是病人端的言談回應，它跟所有其他意識的一般性動機一樣。兩者就算有別，也只是內容上的差異，並非本質存在上的不同。這是因為在方法論上，潛意識的內容（也就是各種壓抑的情結）皆被佛洛伊德委任至一個人的過去，也就是早年的孩童時期。但這些早期發展的情結則建立在成人提供的證據之上。這種從早期孩童經驗中重構的回溯法，奠基於成人的回憶，對 Vološinov 而言乃是「從現在的觀點詮釋過去」（同上引，頁 81）的「意識」行為：

任何對我們過去內在經驗的客觀回憶，都是無稽之談。我們看見的過去，只有對於現在而言重要的部分，只有對我們正在回憶過

15 在針對臺灣變性評估的醫生和求診者間的對談研究中，陳美華、蔡靜宜（2013）提出了具體的觀察足以輔助本研究此處的討論。她們發現，求診者在進入診間之前，必須先預先準備好一個完整變性念頭的個人生命史，方能取信醫師。這是因為台灣現階段的精神評估只允許求診者為「原發性變性慾」。被診斷為「續發性變性慾」者，則無法施以後續的荷爾蒙治療。而透過精神分析找到求診者明確的「病因」以及天生「原發」並自覺與周遭他人「異樣」的變性需求，更使得台灣變性評估與精神診斷的實務運作全然仰賴醫生自身僵化的、本質論的、真空的判斷，難以關照不同變性主體的分疏差異與心理、精神、經驗的物質性。

去的這個當下重要的部分。我們從現在當下轉移至幼兒前意識過去的部分，僅僅是對現在而言具有思想價值的情結。[精神分析所做的，是把] 所有這些在我們意識生活中的價值、觀點、連結，都與「愛」、「性吸引力」、「母親」等概念加以合併，並且賦予這些概念其自身擁有的複雜情結……。然後我們將其援用來解釋孩童階段的事情，並從中建立與成年時期一致的、有意義的事件 (Vološinov, 1927/1987, p. 81)。

上述引文相當關鍵。這裡，Vološinov (1927/1987) 所架構的馬克思主義心理學很清楚地揭示出人類行為中的內在話語和潛意識，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孤立地說明個別主體。易言之，就算真有佛洛伊德所主張的潛意識，那它也必然要被「轉化為」一個能展現其外在表現的意識，並在其間折射出社會經濟力量的統管和限度。Vološinov 立基於人類心理的物質論、互動論與意識論，進而提出了替代性的嶄新用語：行為意識形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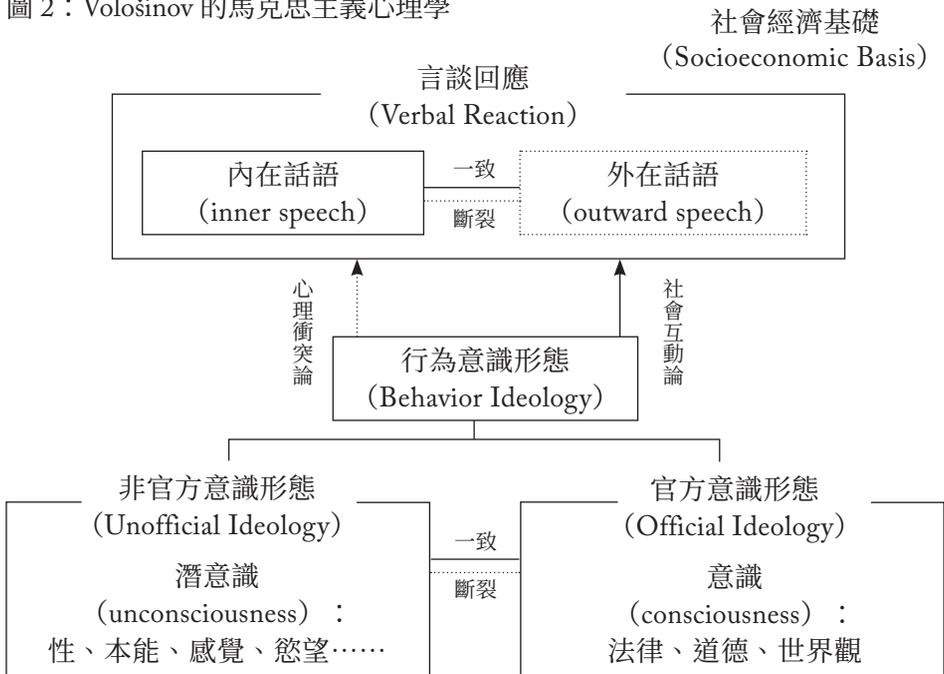
二、行為意識形態的觀點

行為意識形態被定義為「瀰漫於我們行為所有部分的內在話語與外在話語」(Vološinov, 1927/1987, p. 88)。Vološinov 描述其在某些面向上較官方意識形態來得「更為敏感、更具有回應性、更令人興奮且更為生動。在其深處，堆積著那些衝突，一旦達到了某些門檻，最終就會爆發並裂解官方意識形態系統」(同上引)。同時，行為意識形態關乎社會經濟基礎，這裡與古典馬克思所述的意識形態上層結構一樣具有物質性。而從行為意識形態的觀點來看，精神分析所述的潛意識與意識之間的衝突得以被客觀化，並展現在內在話語與外在話語中。

Vološinov (1927/1987) 進一步主張行為意識形態同時具有官方與非官方的屬性。與佛洛伊德主義所述的官方的、監看的「意識」相符的行為意識形態，展現出最穩固、最具主導性的階級意識，並具體體現為「法律、道德與世界觀」(同上引，頁 89)。在此，內在話語很容易形成秩序且「得以自由地轉變為外在話語」(同上引)，因為「在任何狀況裡，內在話語並不畏懼去變成外在話語」(同上引)。相對地，與佛洛伊德主義「潛意識」相符的行為意識形態，看似證實了支配意識形態的統整性和整體性正在解體，但

Vološinov（或許因為立基於對佛洛伊德主義潛意識和性本能理論的不滿）認為這樣的言談回應「僅僅只是預設了個別個體社會階級處境的蛻變」（同上引），或者頂多只能預示著解體正在開始。在此，Vološinov 提出了以下的小結：「在一個健康的社群和一個社會健康的個體中，行為意識形態奠基於社會經濟基礎之上，乃是強大的、牢固的——這裡，在官方意識和非官方意識之間，沒有分歧」（同上引）。

圖 2：Vološinov 的馬克思主義心理學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對 Bakhtin 思想有所涉獵的研究者不難發現上述說法確有令人再三思量之處。因為按照 Vološinov (1927/1987) 所言，官方意識形態的解構並非不可期待，但其可能性僅被放置於潛意識的層次。而潛意識在巴赫汀學圈的佛洛伊德主義研究中，又被暗示是一個「否定意識」（同上引，頁 12）、「恐懼歷史」（同上引，頁 11）的境地。在那裏，思想體系的核心乃是生物學上的意義和主觀心理學，而非客觀的社會經濟類目。既是如此，我們如何想像人類藉由言談回應、內在話語的心理—衝突性而「持續地與官方意識形態進行鬥爭和衝突」（同上引，頁 90）？或者，Vološinov 此番透過揭示行為意識形

態同時具有官方與非官方的雙重性，除了用以揭示馬克思主義對於人類心理動力的理解相較於佛洛伊德主義來得更為周延，更意圖在字裡行間透露出其對於人類意識的外部化、內在話語的社會性以及言談回應的社會—互動模式之偏好遠高於佛洛伊德主義所論及的性、本能、感覺、慾望？本研究試圖統整 Vološinov 上述所言，將馬克思主義心理學的整體運作繪製為圖 2。

圖 2 參考自圖 1 的邏輯。圖 2 中心為行為意識形態，這是 Vološinov (1927/1987) 論述內在話語與外在話語之間對話性的起點。而這樣的對話所具體展現出的官方與非官方意識形態的鬥爭，在 Vološinov 的思想體系中取代了佛洛伊德主義所使用的潛意識和意識等用語。圖 2 最外圍乃是社會經濟基礎，用以彰顯唯物史觀。而官方 vs. 非官方意識形態、內在 vs. 外在話語之間或一致或斷裂的可能性，則彰顯出馬克思主義心理學所強調的彈性與辯證性。這樣的彈性辯證因 Vološinov 的確曾交代行為意識形態具有解構官方意識形態的可能性，且這樣的可能性必得「透過語言」而被再現或創造，因此圖 2 右上方的「外在話語」宜以虛線呈現其不穩定性。¹⁶ 虛線的表現方式在圖 2 更指陳當非官方的潛意識、內在話語與官方的意識、外在話語因無法產生一致性而出現斷裂時，則外在話語所再現的法律、道德、世界觀恐有鬆動或裂解之虞。甚至是，當內在話語在言談回應中展現出不可化約的性、本能、慾望、感覺，則行為意識形態的心理—衝突論本就得以折射出外在話語的偶然性特質而非必然性。這裡，內在話語與外在話語之間的互動實乃一種非常低度的對話關係，它不以動員某種意識形態鬥爭為務，亦不訴諸在語藝策略上有所擊劃以發起由下而上的論述行動並改造政治社會，而僅在彰顯確實存在著無法在社會—互動中被理解和界定的內在話語。

16 審查委員之一指出，真正不穩定的是官方意識形態，為何圖 2 右下方並未同樣以虛線呈現？對此，本研究一方面同意在 Bakhtin 不同時期的論述中，皆對官方、主流、既定、應然的價值體系與結構保有某種程度的敵意，因此若主張官方意識形態應具有某種開放性，言之成理；但另一方面，本研究亦有以下兩點主張和澄清。首先，在 Bakhtin 所想像和構築的開放社會中，官方體系的動態性並非本質先驗的客體，而必須「透過（包括身體）語言的運作或中介」方能體現。語言作為再現機制的重要性，及其挹注行為意識形態朝向更為敏銳、回應、活潑的態勢發展，也應適時標示出來。因此，在行為意識形態所未鬆動的官方意識形態部分（也就是與佛洛伊德所述之與意識相符的區塊），本研究似以實線繪製為妥。再者，Bakhtin 事實上對於佛洛伊德精神分析於歐洲的成功，是有所不滿的。他認為精神分析過度「去脈絡化」的論點將使得行為意識形態自行其事、七零八落、沒有定型，而生活中的每個面向、事物與對象也將失去其「階級和社會價值」（Vološinov, 1927/1987, p. 90）。在此，Bakhtin 對於官方意識形態的討論，確實比較訴諸其穩定性，並主張這樣的穩定性才是有意義的社會關係——當然，這樣的穩定性並非一種極權話語、父親語言的狀態，而是等著被語言、行為意識形態給佔用、挪用甚至是某種程度（無法）轉化的相對的秩序，即圖 2 右上方之「外在話語」。

內在話語於此呈現出難以被整併，亦無法轉化為外在話語的符號曖昧性，使其既身處於社會經濟基礎的脈絡，卻又展現為一種將普遍性給個體化 (individualizing universality)、將個體從集體身體中破解出來 (breaking-out the individual from the collective body) 的主體位置。內在話語據此絕非顧影自憐的內在性，而是解構性的自我肯認 (destructive self-affirmation)。

只是，我們該如何思考這個一致或斷裂的屬性？或者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地追問的是：Bakhtin 是否充分地肯定或掌握這樣有別於社會—互動性的語藝時機？答案可能要有所保留。Vološinov (1927/1987) 有以下的說法：

官方與非官方意識的斷裂越廣越深，內在話語的動機就越難以轉化為 (to turn into) 外在話語 (口頭的、書寫的或印刷的……) 並且形成定義、清晰性和嚴謹度。動機在這樣的處境下，就開始衰敗，失去其話語面目，並且逐漸地轉變為心理、精神中的「異體」 (a “foreign body” in the psyche)。整個有機彰顯的部分在這裡，也被排除在語言行為的領域之外，且成為了「與社會無關的東西」 (asocial) (Vološinov, 1927/1987, p. 89)。

這段文字透露出幾個線索，亦幫助我們繼續說明前述尚未說明的圖 2 的其他部分。首先，Vološinov (1927/1987) 顯然在馬克思主義心理學中，欲透過於其物質論、互動論與意識論建立自身的學術品牌；更重要的是，藉此將佛洛伊德主義貶抑和退化為不具社會性甚至是無關乎語言的思想。雖然 Vološinov 又說不見得所有無法「轉化為」外在話語的內在話語的心理—衝突皆會消逝，亦有可能在壓抑的狀態找到「有益的政治背景」(同上引，頁 90)。但是內在話語的心理、精神區域「最容易成為社會退卻的基地」(同上引)、「最容易被孤立和轉化為一個空無一物的小宇宙」(同上引)，確實是 Vološinov 不停覆誦的基調。

再者，上述基調若放在陳述言談回應如何在社會經濟基礎中展現社會連結，肯定具有解釋力。這條思考路徑也是巴赫汀學圈後續在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研究發揚光大的前身。在那裏，Bakhtin (1994a) 直指表述中的「我一經驗」嚴格來說並不存在，因為「我們一經驗」所揭示的人類話語意識在彼此影響和挪用之際所成就的主體性，才是意義從何而來的所在。

然而，如果我們肯定言談回應的社會—互動論並非唯一思考人類心理發展的管道，也就是說個人心理的外在體現並非「自始自終都是單一的路徑」

(Vološinov, 1927/1987, p. 87)，且透過佛洛伊德主義的觀點，我們確實看到某些內在話語在「轉化為」外在話語的對話過程中面臨難以為繼的心理—衝突，而這樣的心理—衝突所體現的性、本能、感覺、慾望並非與社會無涉、與語言脫勾，則我們可以說巴赫汀學圈在佛洛伊德主義的批判性研究中，確實比較無法或不偏好將關愛眼光投以至「言談回應的立即場域」(the immediate context of utterance)——這是一個社會經濟基礎中，不務求一致性轉化而更看重潛意識、內在話語、非官方意識形態 vs. 意識、外在話語、官方意識形態之間難以化約也無法全然排除的斷裂對話關係。

在此，維繫「我一經驗」在本體論上不同於「我們一經驗」的物質性，並非擁護知識論上的本質主義、生物生理學或主觀心理學，更非一種進入語言之前的歷史先驗性或超驗性，而是嘗試推敲一種並不否定社會結構的存在運作力量，但重點卻從「自我與他者的對話」轉向「自我與自我的關係」，並探討後者所體現的心理—衝突模式的對話如何凝聚其無法「轉化為」外在話語的語藝處境或困境。圖 2 左半部所示，可以說在巴赫汀學圈的佛洛伊德主義研究時期，並未獲得與右半部同等的耕耘對待。此舉當然導致了後續學者在接收 Bakhtin 思想時，缺乏對於心理—衝突模式的「對話論」之關注。

對此，當代國際巴赫汀研究社群之重量級研究者邁克爾·霍奎斯特 (Michael Holquist, 1935–2016) 指出，Bakhtin 所想像的語言，其運作唯有在「超越自我與自我的範疇」(Holquist, 2002, p. 170) 才得以可能。因此當我們被語言「佔據」(invade)，或者說我們「進入」(enter) 語言時，我們則銘刻於一個高度特殊的經濟、政治和歷史諸力量之中，被給予「適切的名字」(proper name)。雖然一個完整的語言具有「變動性／內容語意面向／言語行動」和「不可變動性／形式面向／語言系統」，亦即穩定性和動態性同時在語言中運作；但是，由於 Bakhtin 相信我們跟周遭環境的關係乃是一種「不完全是巧合的」(not completely coincidental) (同上引，頁 169) 一致性，因此言語行動實難擺脫語言系統。人的表述、話語既受到抽象的、規範性的類目 (語言系統) 給影響，同時又體現一個「特殊的、顯得相對開放的類目」(同上引)，即自我。這種狀態基本上仍是結構主義。

Holquist 的批評有些聳動，或許也太過嚴厲。因為如果我們確實肯認巴赫汀學圈在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研究中，對於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結構主義流於抽象客觀所展現的敵意與敵對 (Vološinov, 1929/1986)，則此番將 Bakhtin 界定為結構主義者，可能並不公

允。但 Bakhtin 因汲汲營營地在意表述與言談回應的內在社會性，確實也明白地指陳個體內在的經驗 (experience) 並無主導外在話語闡述 (expression) 的可能性。Bakhtin 甚至在其強調社會—互動性的「對話論」中，主張那些認定內在話語得影響外在話語的歐陸其他學說，乃是訴諸前者的歷史先驗性，而忽視語言的社會約定俗成 (王孝勇，2009)。

同樣認為巴赫汀學圈不脫結構主義色彩的另一位批評者 Neal Bruss，有以下較為和緩的說法：

結構主義——Voloshinov, Saussure 與其他人——無法在語言獲致、修辭變化或歷史變遷中陳述衝突與其後果。約定俗成的預設並未伴隨著「解」或「反」約定俗成：[結構主義] 視溝通的混亂失序 (communicative chaos)、非對立 (not opposition)，為先於社會約定俗成之前的案例。其基本的預設將自身局限於對神話般的社會約定俗成之重述：將語言形式和一種或另一種社會—脈絡的特徵加以連結，無論是純粹的語言學脈絡、使用脈絡，或者是使用者的人口統計學 (Bruss, 1987, pp. 135-136)。

Bruss 據此指出，巴赫汀學圈和其所批判的精神分析其實都有機會呈現出所謂的意義多重決定。尤其是精神分析對於徵狀的解讀在臨床上並非如 Vološinov (1927/1987) 所指控的定於一尊和機械性，而是有各種可能的意義闡釋。這點與 Bakhtin 所述的言語行動的開放性並無二致。因此，社會性和心理性很可能只是術語上的側重有所不同，而精神分析對於心理—衝突性的推敲使其更擅長重構「衝突中的諸力量以及其中關乎主體意向 (intentionality) 的心理價值觀」 (Bruss, 1987, p. 136)，以及「人如何以內在話語或其他形式，認知和陳述衝突」 (同上引)。Bruss 認為指出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若無心理—衝突性的勾勒，「對話論」與馬克思主義心理學所欲企及的多重決定論頂多只能有形無實。

Bruss (1987) 的主張與 Holquist (2002) 的嚴詞相當程度反映著本研究的立場。也正因如此，本研究此番對於巴赫汀學圈佛洛伊德主義的理論回顧，旨在彰顯圖 2 左半部的關鍵位階，及其經常為人忽略所導致的對「對話論」的另解缺乏意識。本研究主張若忽略此一另解，我們對於「對話論」的認識將僅停留在日常語言的一般性、普遍性的層次，而無法關照到主體無法輕易進入對話體系、卻又並非置身於語言世界之外的特殊景況。

延續上述，我們可以說，主體的自我敘述、內在話語並非活在一個孤立的個體意識之中；相反地，它同時具有「對自己」與「對世界」的雙重意向。這使得自白的自我表述力量得到了強化，使其能夠抵抗外在話語的定論、收編或批判。然而，這樣的主張在 Bakhtin 的書寫中尚待具體的例說。Bakhtin 在佛洛伊德主義的批判性研究中也並未說明主體的認知，或者圖 2 左下方所呈現的馬克思主義心理學所不屑蔑視的人的性、本能、感覺、慾望如何依境而生，成為了主角成就內在話語的媒介素材。有鑑於此，本研究將以 Judith Butler (2001) 變性敘事研究所提及的一個經典個案，對心理—衝突模式的對話觀進行初步的理論補充、說明和接合。

肆、變性敘事的心理—衝突性（代結語）

Butler (2001) 曾針對 1965 年加拿大的一起強制變性案例 “John/Joan Case” 進行研究。John 是假名，指稱一個生下來具有 XY 染色體的「正常」雙胞胎男孩。當他六個月大時，他的陰莖在割包皮手術中因為醫生不熟悉新的機器而被嚴重灼傷。事發一年後的某個傍晚，John 的父母從電視上看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教授約翰·曼尼 (John Money, 1921–2006) 主張，假如一個小孩在開始社會化之前就接受變性手術，則他（她）未來將得以完美地適應變性後的新的性／別、開心生活。John 的父母透過管道聯繫上 Money 教授，在後者的強烈建議下同意摘除孩子的睪丸，並初步重建了陰道，待改名為 Joan 的孩子年紀再大一點，再做全套性別重建。

Butler (2001) 指出，Money 的「幼兒性別中立論」所述的性別的可鍛造性 (the malleability of gender) 被之後的現代女性主義運動挪用來指稱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社會文化成規是可以被改變的，據此挑戰性別差異的生理學或解剖學基礎。然而，隨著 Joan 在八到九歲間開始發展出想要購買玩具槍的「慾望」、九到十一歲之間開始「意識」到自己並不是個女孩 (用 Vološinov 的話說，這即是內在話語與外在話語之間產生斷裂)，甚至開始在學校站著尿尿被人看到，這些舉措或者是 Joan 對於自我感受到的身、心矛盾所產生的言談回應，於是引來 Money 與其精神醫療團隊更緊密持續的「監看」。Joan 終於在十四歲那年開始接受男性荷爾蒙治療並移除乳房，隔年重建陰莖。這使得不同於性別中立論的另一種理論逐漸浮上檯面，亦即主張「連結至其原本生殖器官，有一個內在真理的必要場域，並不會被後天的社會化

改變撼動」(同上引,頁 625)。這個說法被視為比較接近本質化的性／別觀,更是後續北美雙性人運動要求父母必須停止對雙性嬰兒作強制性的矯正手術,而應等孩子具備自我意識,依其內在話語的感覺、經驗和慾望自主選擇是否動手術抑或維持雙性身體狀態的理論依據。

以反本質論和後結構主義享譽國際知識圈的 Butler, 在此事件中站在哪個位置? Butler (2001) 引述了兩段 John 的自我陳述、內在自省:

一開始有些小事。我開始覺得我的感覺和我被期待的樣子之間有些差距。但我並不知道那意味著什麼。我以為我是怪胎。……我看著我自己,然後我說我不喜歡這樣的服裝打扮,我不喜歡這種玩具。我喜歡跟男孩們玩耍、爬樹,做些女孩們不喜歡做的事情。我看著鏡中自己的肩膀很寬,我是說我看起來一點都不女性化。除了我身形瘦弱,沒有其他的部分像是女生 (Diamond & Sigmundson, 1997, pp. 299-300)。

醫生,……說,那會很艱難,你必須要挑選,你將會非常寂寞,除非你做了陰道手術並且以女人身分生活,否則你不會找到任何伴侶。你知道,當時我年紀很小,但我覺得那些人非常淺薄,因為他們認定在我身上只有唯一一種選擇;也就是人們若得以結婚、有小孩、有具有生產力的人生,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們在雙腿之間擁有的東西。……假如他們只是用這種角度看待我,以「雙腿之間的東西」衡量我的價值,那麼我將成爲一個徹底的失敗者 (Diamond & Sigmundson, 1997, p. 301)。

兩段引文有以下幾個重點。首先,Butler (2001) 肯定主體自我敘述的語言例證在變性敘事中來自主體的「內在真理」。而這種內在真理並非一種先驗存在的本質狀態,而是在性別的可鍛造性被暴力地強加於人的身、心,所回溯性地揭櫫「天生自然」亦屬人為誘導的狀態。這裡,無論是性別本質論所述的性意識與身分認同關乎生殖系統,或是建構論與性別中立論所述的自我的性別認知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鍛造,皆無法清晰斷言 John 內在話語的迸生。變性敘事的個案與本研究欲探索的內在話語自我意識從何而來、以及內在話語的物質論,互相呼應。

亦即,內在話語透過內省和自白的方式陳述其所認知的真理,由此決定

了自己的樣貌。而內在話語的醞釀、外顯與再現更直指「性『始終是性別』」(sex is “gender all long”) (Butler, 1990, p. 8) 的主張明顯無法關照到那些(被迫)經歷生理性與社會性別之間創傷性分裂的變性者(Prosser, 1997)。因為對 John 而言,性的本能、感覺、慾望來自於醫病互動中對醫療論述及其背後所鞏固的社會經濟基礎感到懷疑,據此逐漸凝聚為某些身體內部歸屬的認知,此即「內在身體的感覺」(趙庭輝, 2019, 頁 30) 或者 Bakhtin 所述之內在話語。內在話語在此一方面體現了變性者的性總是真實的、物質的、血肉之軀的心理一衝突而非唯意志論的個體自我意識和內在真理,另一方面縱使可能面臨與外在話語、「我們一經驗」之間的矛盾斷裂而受限,卻可能是充滿語藝動能的「我一經驗」主體性共生之對話互動場域。本研究以實線而非虛線繪製圖 2 左上方的內在話語輪廓,至此得到了合理性。

再者,Butler 指出透過自我陳述,我們可以清楚看見「自己想要被別人理解的部分」以及「外在世界早已充斥著規範」之間的隔閡難以化解。John 的宣稱在最基本的程度上告訴我們他理解「就在那裏」有一個規範,即女性特質(femininity)。那個規範卻是他被期待要成為的樣子。但 John 對於那種強迫監看感到遙遠陌生與敵意排斥。這裡,規範或者 Vološinov (1929/1987) 所說的社會經濟基礎和外在話語除了並非在理想的層次上被發現,亦有可能在規範欲傳遞的偏差和怪異上被看見(亦即內在話語無法「轉化為」外在話語的立即溝通情境)。因此當 John 宣稱自己不喜歡這身服裝打扮、不喜歡這種玩具時,他的內在話語與自我意識更切身地展現出外在世界觀、道德、法律的邏輯,以及這套邏輯本身乃係偶然性所以逼人照單全收的性/別暴力事實。這裡,變性敘事示現著跨性別主體冒著「本質化的風險」(the risk of essentialism) (Prosser, 1998, p. 17; Sedgwick & Frank, 1995, p. 513) 所產製的行為意識形態,並非內在話語意識的本質化,而是脈絡化地折射出大寫文化再現和法律的欲蓋彌彰。

最後,Butler 指出雖然 John 最後重新獲得了男性身分進行陰莖重建,但「他早已經不是跟他現在的男性身體一樣的東西」(Butler, 2001, p. 633)。因為不同於主流的性/別二分法用生殖器官界定人的性身分,John 明白拒絕人們用「雙腿之間的东西」衡量他的價值。Butler 認為 John 此處的宣言並非關乎重建後的陰莖是否具有性快感或性功能這個生理學的討論,而是 John 早已經建立了一種不是把「我」與解剖學上的性/別規範畫上等號的存在價值,更是對「區分本身的絕對論」(同上引,頁 634) 保持敵意。也就是說,單

靠有陰莖這件事情無法建構 John 的存在完整性，因為在「他現在是誰（who he is）和他擁有什麼（what he has）之間存在著不可共量性」（同上引）。

我們可以說，第二次變性手術的陰莖重建並未把 John 變成了妥協於性／別規範之人。因為陰莖重建使得 John 得以在象徵與物質層面擺脫被他人決定的性／別處境與困境而重新獲得生理性的自決，他仍是那個具有言談回應、堅持和自我意識的跨性別主體，而並非被「我們一經驗」滲透浸潤的存在狀態。John 的肉身存在所揭櫫的內在話語本身難以「轉化為」外在話語的衝突狀態，更可被視為跨性別行動主義（transactivism）對當代身分認同進行政治干預的行動模式。¹⁷ 變性敘事在此基礎上，得擴展並肯定了馬克思主義心理學對於內在話語及其心理—衝突對話性的勾勒，進一步對此提供兼具物質性、互動性與意識層面的例說。

對此 Butler 主張，John 的變性敘事匯聚為他透過話語，對諸多外在規範和可理解性本身（intelligibility itself）的批判觀點。John 基於內在意識而拒絕進入某種可理解性的範疇以便說話和被認知。他的存在現身是一種對環繞在其周遭的質問詞彙有意識地反轉：

John 並沒有佔據一個嶄新的世界，因為他甚至仍然在他所帶來的「我」的語法之中，仍然被定位在規範與其失效之間的某處。最終，他是一個以匿名身分存在的人類，因為我們迄今尚不知道如何命名或者對於所有命名劃定界線。在這個意義上，他是匿名的——

17 這裡可以提出的思考是：John 透過陰莖重建而重新獲得男性身分，為何可以算是主體性與不妥協？沒有陰莖的男性不是更具有顛覆性嗎？這也是其中一位匿名評審的提問。事實上，在跨性別社群內部，對於性別重建手術究竟是種抵抗，或其實是對性別秩序和性／別二元論的鞏固，持續存在著辯論。晚近更有「後變性論」（posttranssexuality）的觀點，主張跨性別者不應該以變性後回歸一般生活的「矇混過關」（passing）為務；相反地，被刻意辨識出主體的變性史或主動選擇以變性者的身分出櫃、說話，方能瓦解傳統約定俗成的性／別論述（Feinberg, 2004 / 陳婷婷譯，2006；Bolin, 1993；Stone, 1992）。對此，本研究有以下兩點想法。首先，在臨床上確實曾發現部分的女變男變性者，在移除原先的女性生殖器官後，更傾向進行「非必要的」陰莖重建（「非必要」是指重建後的人工陰莖並沒有辦法真正像原生生理男的陰莖具有充血勃起、高潮射精等功能）。這主要是受限於父權文化所設定的男子氣概想像，認定「有陰莖」的人才能稱作男性（王孝勇，2020）。我們亦可說這樣的心態比較貼近「我們一經驗」的性／別結構化。然而，有越來越多的女變男因為擔心感染、拒絕自殘（Rees, 1996），甚至是相當具有自我意識地質疑「為何性交必然涉及一根陰莖和一管陰道」（Califia, 1997, p. 5），而在變性過程的某一個時間點上拒絕陰莖成形術。所以，用是否動手術接受性別重建或是否做了全套變性來論斷變性者的主體性，可能需要更考量到每一個主體依境而生的選擇與判斷。再者，本研究同意在身體改造上維持一種無法置入性／別二分法的曖昧狀態確實具有相當的衝擊性。但擁有某種歸屬感、以自己認定的自我和身體形貌被看見，也不能馬上被等同於性／別政治的失守（Prosser, 1997）。更何況本研究討論的個案 John，他的陰莖重建確實是一種性／別身體的自決與主導。在此，跨性別主體的超越（beyond）或跨越（transing）如何可能？又意味著什麼？尚需要更多的理論和經驗研究。

以及批判性的——人類存在條件，因為人類存在條件僅在我們認為我們已知的界線內，提供自我陳述 (Butler, 2001, p. 635)。¹⁸

從上述變性敘事研究的討論回看巴赫汀學圈的佛洛伊德研究，我們可以說，1920 年代的 Bakhtin 對於內在話語以及主體內在自我的思想、感覺、感官、嗜好、慾望的討論，傾向拒斥一種極端內在性的潛意識和意識的運作。這是因為他相信個體意識的內在化縱使以其自身的方式展現出差異，仍得與外在話語維繫一種極大化的親切稠密互動 (McCaw, 2014, 2016)。然而，無論從 Bakhtin (1965/1984) 晚期狂歡節研究中所描繪的飢餓之人可以盡情吃喝、朋友可以在毫無惡意的慾望中產生交際、權威得以被去冕，乃至於最重要的是身體內在的話語意識得以被慶賀……，或者是 Bakhtin (1963/1984, 1993, 2004) 一貫地對個體在普遍化、外在化過程中不得喪失符號曖昧多義性的堅持，他對於言談回應、行為意識形態應具備的內在不可預測性和難以抑制性的暗示，足見「轉化為」某種「檯面上的觀點」(Bakhtin, 1990, p. 71) 亦非「對話論」的唯一要旨。

現今國際巴赫汀研究社群之另一位重量級研究者 Caryl Emerson (2015, p. 190) 說，1920 年代的 Bakhtin 「尚未正式形成其『對話論』」。本研究會說，巴赫汀學圈對佛洛伊德主義的批判似已開展出某種後續在「對話論」的全球擴散和接收中，雖較不被人重視或正視，卻更直接地關切主體內在的不可化約性之價值觀與世界觀。甚至，透過主體內在話語、感覺、慾望、動機在持續存在之際所展現出的與外在話語間的異質性和斷裂，以及內在話語難以「轉化為」外在話語的語藝處境或困境，反而有機地建構出外在話語、官方意識形態本身的難以為繼。這樣的難以為繼並非文化轉型或政治權威未穩階段所釋出的官方虛假善意，而是奠基於社會經濟基礎的法律、道德與世界觀本就無法整全 (not-whole) 的事實，以及內在話語在心理—衝突的對話回應中所折射出的生活表現。

18 值得說明的是，雖然從接受變性手術這個點上，本研究在正文的書寫中暫時傾向將 John 界定為變性者或跨性別。但 John 從被迫變性、重新選擇二度手術「變回來」，到他在變性敘事中明確交代自己對於性／別二分法的置疑，這個跨出去的整體語藝歷程與當代慣用的無論是變性或跨性別的概念，似有部分本質上的差異。John 難以被名狀的性／別位置和困境，與本研究所詮釋的難以「轉化為」外在話語的語藝處境，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參考文獻

- 王孝勇 (2009)。〈掙脫語言的枷鎖？從 Mikhail Bakhtin 論「表述」談起〉，《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30：203-244。http://doi.org/10.6523/168451532009090030005
- _____ (2011)。〈Mikhail Bakhtin 狂歡節概念的民主化意涵：從批判取向論述分析的理論困境談起〉，《新聞學研究》，108：183-223。http://doi.org/10.30386/MCR.201107_(108).0010
- _____ (2012)。〈Mikhail Bakhtin 的對話主義及其對批判論述分析的再延伸：以白玫瑰運動為例〉，《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0：149-202。http://doi.org/10.6523/168451532012030040004
- _____ (2013)。〈從對話到對立的民主化實踐——Mikhail Bakhtin 對話主義的理論轉折與政治方案之初探〉，《台灣民主季刊》，10 (3)：1-39。
- _____ (2014)。〈眾聲喧嘩即倫理實踐：從 Mikhail Bakhtin 的語藝觀談起〉，《中華傳播學刊》，26：137-173。http://doi.org/10.6195/cjcr.2014.26.05
- _____ (2019)。〈對話之外：從巴赫汀晚年「外部性」的觀點新義看理解的（不）可能性〉，《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70：57-108。http://doi.org/10.6523/SOCIETAS.201909_(70).002
- _____ (2020)。〈「謝尖順事件」之媒體語藝框架分析：「跨性別國家主義」的觀點〉，《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17：47-111。
- 陳美華、蔡靜宜 (2013)。〈說些醫生想聽的話——變性評估的性／別政治〉，《台灣人權學刊》，2 (2)：3-39。
- 陳婷譯 (2006)。《藍調石牆 T》。商周。（原書 Feinberg, L. [2004]. *Stone butch blues*. Firebrand Books.）
- 趙庭輝 (2019)。〈變性者電影的誕生：《男變女》變性敘事的文本分析〉，《藝術學報》，105：27-46。
- 劉 康 (1995)。《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麥田。
- 劉毓秀 (2000)。〈精神分析女性主義：探測陽具的版圖〉，顧燕翎（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頁 159-200。女書文化。
- Bakhtin, M. M. (1984).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C. Emerson, Tran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3) http://doi.org/10.5749/j.ctt22727z1

- _____ (1984). *Rabelais and his world* (H. Iswolsky, Tran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5)
- _____ (1990). Author and hero in aesthetic activity. In M. Holquist (Ed.), *Art and answerability: Early philosophical essays* (pp. 4-256).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_____ (1993). *Toward a philosophy of the act*.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_____ (1994a). Language as dialogic discourse. In P. Morris (Ed.), *The Bakhtin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akhtin, Medvedev and Voloshinov* (pp. 48-61). Arnold.
- _____ (1994b). Speech genres. In P. Morris (Ed.), *The Bakhtin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akhtin, Medvedev and Voloshinov* (pp. 80-87). Arnold.
- _____ (2004). *Speech genres & other late essays* (V. W. McGee, Tran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olin, A. (1993). Transcending and transgenering: Male-to-female transsexuals, dichotomy and diversity. In G. Herdt (Ed.), *Third sex, third gender: Beyond sexual dimorphism in culture and history* (pp. 447-486). Zone Books.
- Bruss, N. H. (1987). V. N. Voloshinov and the basic assumptions of Freudianism and Structuralism. In N. H. Bruss (Ed.), *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 (pp. 133-143).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 _____ (2001). Doing justice to someone: Sex reassignment and allegories of transsexuality.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7(4), 621-636. <https://doi.org/10.1215/10642684-7-4-621>
- Califa, P. (1997). *Sex changes: The politics of transgenderism*. Cleis Press.
- Capizzo, L. (2018). Reimagining dialogue in public relations: Bakhtin and open dialogue in the public sphere.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44(4), 523-532.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18.07.007>
- Clark, K., & Holquist, M. (1984). *Mikhail Bakht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llado, S., & Besoain, C. (2020). Becoming in resistance: The (un)creative relation between non-heterosexual 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suffer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502755.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0.502755>

- Dey, S. (2015). Re-contextualizing Mikhail Bakhtin's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through classroom teaching: Re-presentation of monological/dialogical conflicts in stud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Language in India*, 15(4), 203-210.
- Diamond, M., & Sigmundson, H. K. (1997). Sex reassignment at birth: A long term review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Archives of Pediatrics and Adolescent Medicine*, 151, 298-304. <http://doi.org/10.1001/archpedi.1997.02170470096022>
- Emerson, C. (2015). Bakhtin and the actor (with constant reference to Shakespeare). *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67(3), 183-207. <http://doi.org/10.1007/s11212-015-9238-1>
- Farsi, R. (2015). Biotext: Deleuze and Bakhtin. *Language in India*, 15(3), 66-84.
- Freud, S., & Breuer, J. (1895). *Studies on hysteria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n Sigmund Freud, vol. 2*. The Hogarth Press.
- Guillemette, D. (2017).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Towards a nonviolent mathematics educatio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96(3), 349-365. <http://doi.org/10.1007/s10649-017-9774-3>
- Hinchion, C., & Hall, K. (2016). The uncertainty and fragility of learning to teach: A Britzmanian lens on a student teacher story.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46(4), 417-433. <http://doi.org/10.1080/0305764X.2015.1064095>
- Holquist, M. (2002). *Dialogism: Bakhtin and his world* (2nd ed.). Routledge.
- Kristeva, J. (1980).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amarche, J. B. (2017). The elusive transpositions: A situational, dia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account of psychoanalysis. *Language & Dialogue*, 7(3), 432-451. <https://doi.org/10.1075/ld.7.3.06lam>
- Macaskie, J. (2016). A railway junction, two saints and a queen: Time and space in stories of psycho-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ling*, 44(3), 325-334. <https://doi.org/10.1080/03069885.2016.1169365>
- McCaw, D. (2014). Paradoxes of acting: Bakhtin and Stanislavsky. *New Theatre*

- _____. (2016). *Bakhtin and theatre: Dialogues with Stanislavsky, Meyerhold and Grotowski*. Routledge.
- Milthorpe, N. (2015). “Heavy jokes” : Festive unpleasure in the interwar novel.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38(3), 71-85. <https://doi.org/10.2979/jmodelite.38.3.71>
- Morson, G., & Emerson, C. (1990). *Mikhail Bakhtin: Creation of a prosaic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ller, F. (2016). The dialogical self in psychoanalysis.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85(4), 929-961. <https://doi.org/10.1002/psaq.12111>
- Prosser, J. (1997). Transgender. In A. Medhurst & S. R. Munt (Eds.),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p. 309-326). Cassell.
- _____. (1998). *Second skin: The body narratives of transsexual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6). Judith Butler: Queer feminism, transgender, and the transubstantiation of sex. In S. Stryker & S. Whittle (Eds.),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pp. 257-280). Routledge.
- Rees, M. (1996). *Dear sir or madam: The autobiography of a female-to-male transsexual*. Cassell.
- Reinsmith-Jones, K. (2013). Transsexualism as a model of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LGBT Family Studies*, 9, 65-99. <https://doi.org/10.1080/1550428X.2013.748509>
- Schwarz-Franco, O. (2018). Polyphonic teaching: The ability to facilitate multiple voices as a crucial teaching skill. *Educational Studies*, 54(4), 429-447. <https://doi.org/10.1080/00131946.2018.1474112>
- Sedgwick, E. K., & Frank, A. (1995). Shame in the cybernetic fold: Reading Silvan Tomkins. *Critical Inquiry*, 21(2), 496-522. <https://doi.org/10.1086/448761>
- Stone, S. (1992).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A posttranssexual manifesto. *Camera Obscura: Feminism, Culture, and Media Studies*, 10(2), 150-176. https://doi.org/10.1215/02705346-10-2_29-150
- Suárez, J. A. (2015). The Kuchars, the 1960s and queer materiality. *Screen*, 56(1), 25-45. <https://doi.org/10.1093/screen/hjv003>

- Sučeska, A. (2018). A Gramscian reading of language in Bakhtin and Voloshinov. *Language Sciences, 70*, 179-192. <https://doi.org/10.1016/j.langsci.2018.08.005>
- Titunik, I. R. (1987).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N. H. Bruss (Ed.), *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 (pp. xv-xxv).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Wertsch, J. V. (1987). Foreword. In N. H. Bruss (Ed.), *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 (pp. vii-xiv).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Vitanova, G. (2013). Dialogue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Language & Dialogue, 3*(3), 388-402. <https://doi.org/10.1075/ld.3.3.03vit>
- Vološinov, V. N. (1986).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 Matejka & I. R. Titunik, Tra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9)
- _____. (1987). *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 (I. R. Titunik, Tran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
- Xu, K. (2013). Theorizing differenc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critical dialogic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80*(3), 379-397. <https://doi.org/10.1080/03637751.2013.788250>
- Yanchuk, V. A. (2018).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the sociocultural-interdeterminist dialogical metatheory of the integration of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Journal of Russian & East European Psychology, 55*(2/3), 241-286. <https://doi.org/10.1080/10610405.2018.1529531>
- Zou, S. (2018). From inarticulacy to care: Exploring dialogical approaches to journalistic represent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Journalism Practice, 12*(4), 382-399. <https://doi.org/10.1080/17512786.2017.1299585>

本文引用格式

- 王孝勇 (2022)。〈從巴赫汀學圈對佛洛伊德主義的批判論「對話論」另解：以變性敘事為例〉，《傳播研究與實踐》，12 (2)：177-210。 <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2071202007>
- Wang, H. Y. (2022). Reviving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dialogue” from the Bakhtin Circle’s critique of Freudianism: The case of transsexual narrativ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2), 177-210. <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2071202007> [Text in Chinese]

Reviving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Dialogue” from the Bakhtin Circle’s Critique of Freudianism: The Case of Transsexual Narratives

WANG, Hsiao-Yu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revive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theorize “dialogue” from the Bakhtin Circle’s critique of Freudianism and elaborates that how the psychic-conflictual model of dialogue can be employed to analyze transsexual narratives. The study begins by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review and critical reading on *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 by Vološinov. Although Bakhtin criticized Freudianism as having the tendencies of “distrust of consciousness” and “fear of history” and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intersubjectivity in the theory of dialogue, Bakhtin’s theories, paradoxically, cannot escape from the trap of deterministic structuralism. In light of this, the study argues that Bakhtin’s idea of “behavior ideology” is useful in re-examining the emphasis on the inner speech and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subject. Here, the ontological materiality that makes the “I-experience” different from the “We-experience” is never an endorsement of essentialism. It is a shift from “the dialogue of self and other” to “the intrapersonal dialogue.” The study shows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or predicament of how the inner speech of subject cannot successfully “turn into” outward speech and elaborates on how in the case of transsexual narratives this will be re-problematized and analyzed with the psychic-conflictual model.

Keywords: psychic-conflictual model, Bakhtin, Freudianism, dialogue, transsexual narratives

* E-mail: hywang2@pu.edu.tw

Received: 2021.06.15; Accepted: 2021.09.07